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研究的感性转向^{〔*〕}

——评刘少杰教授新著《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

○ 王国伟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与国内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以理论化本质论述意识形态的观点相反,刘少杰教授的新著《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一书,通过将意识形态的实质内涵理解为一组相对稳定的价值信念,论证了意识形态的感性形式。强调感性意识形态有着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既有助于分析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具体面向,又为探讨转型时期维护执政党政治意识形态安全和推进中国意识形态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它体现了20世纪以来的西方学术界关于意识形态研究的感性转向趋势。

[关键词]意识形态;感性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转型;意识形态现代化

近年来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已成为我国学术界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中心刘少杰教授完成的新著《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立场出发,既考察了意识形态的学术传统和发展阶段,又结合实地调查深入分析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变迁。在对国内外意识形态现象进行总体把握的基础上,作者还探讨了转型时期我国政治意识形态安全和意识形态现代化的问题。《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一书是刘少杰教授承担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政治意识形态安全与意识形态现代化的社会学分析”的最终成果,该研究成果已经入选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目前社会学界关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研究的新进展。

作者简介:王国伟,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讲师,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本文系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国外市场社会学理论的当代进展及其本土化研究”(编号13CSH06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意识形态的理论形式与感性形式

在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史中,意识形态始终是一个内容丰富且充满歧义的概念,但那些指向各异的概念共同表明意识形态的本质是一种主观性的价值信念。据此,该书作者认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含义就是“一组相对稳定的价值信念”,^[1]这意味着就意识形态的存在形式而言并非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理论化和体系化的。

国内学术界往往将意识形态视为是一种理论形式,即它是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阶级意识”。^[2]对此,刘少杰教授认为他们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特指和泛指之间的区别。当马克思恩格斯在同青年黑格尔派、杜林、费尔巴哈等人进行论战时,他们确实将意识形态理解为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思想观点;而当他们论述整个意识形态的构成内容时,意识形态就并非仅指哲学、政治和法律等理论形式,还包括仇恨、忧虑、希望、偏见、幻想、信念、情感等^[3]非理论的形式,这两方面的内容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整个上层建筑”。

显然,作为整个意识形态构成部分的希望、偏见、幻想、信念、情感等,不是以概念判断和逻辑推论表现出来的理论思想,而是以非概念、非逻辑呈现的表象性和体验性意识,即感性意识形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与理性的意识形态形式一样,感性的意识形态形式同样也是人们物质实践活动的直接产物。刘少杰教授指出,在人们感性的实践活动之中,理论化的意识形态主要通过生动的感性形象表现出来,并且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一定要同人们的感性因素联系起来才能有效地发挥。该书作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感性形式意识形态的强调,一方面揭示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以“理论化本质”讲述意识形态的偏颇;^[4]更为重要的是旨在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立场出发,承认并正视意识形态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以便于对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广泛存在的意识形态现象和问题开展深入的学术研究。

意识形态不仅存在理论形式与感性形式的类型之分,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层次之别,即那些表现各异的意识形态类型在反应领域、表现形式和信守主体等面存在层级差别性。因此,如果以意识形态的信守主体为依据,则可以将意识形态划分为社会意识形态、群体意识形态和个体意识形态。曼海姆在历史视野中梳理意识形态的概念时,不仅提出了特定意识形态与总体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论述了意识形态的历史演化过程,即由个体的、群体的特殊意识形态向阶级的总体意识形态演变。^[5]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术界在反省与批判社会生活理性化的同时,人类的思想秩序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刘少杰教授认为这一趋势正好与曼海姆概括的进程相反,即由阶级的总体意识形态向群体和个体的意识形态演化。就当代中国而言,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个体化的进程,不仅推动群体意识形态的地位和意义迅速提升,而且也促使复杂的个体意识形态更加多元化、多变化,在提升社会活力的同时,也加大了社

会整合的难度。

二、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型与现代化建设

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意识形态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会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变化,而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深刻而快速的转型,意味着我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明显的结构转型。^[6]在刘少杰教授看来,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型,既表现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价值目标、实践功能、整合方式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也体现在以社会思潮形式存在的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多变化,还表现在民间意识形态从政治领域向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等领域的转移。^[7]

在新形势下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型,尤其是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想的涌入,一些学者据此得出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受到威胁,并处于不安全状态的结论。刘少杰教授认为这是坚持以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的原则立场所做出的一种不符合实际的消极判断。在他看来,多种意识形态同时并存,不仅能够促进文化繁荣,而且有助于各种意识形态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进而能够促使政治意识形态更好地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同改革开放之前的状况相比,当前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状况处于最安全时期。^[8]

在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的背景下,维护我国政治意识形态安全的重点不在于抵御和排斥其他民族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在于大幅度提升执政党政治意识形态安全的根基——社会认同,它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中的传播途径、传播方式以及传播效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电视、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途径发生了重要转变:原来以企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为主的传播途径逐渐弱化,而以电视、互联网和手机为基础的社会传播则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途径。电视、互联网和手机等信息传媒技术在意识形态传播中的广泛运用,不仅扩大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辐射空间与覆盖群体,也促使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由“从语词传播为主向以影像传播为主的变化”。^[9]因此,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率的关键就在于,必须努力“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字内容视觉化、理性概念感性象征化的转变”,^[10]这也是理性意识形态与感性意识形态之间有效沟通融合的过程。

推进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则是与当代中国意识形的发展变迁和存在状况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在刘少杰教授看来,当前研究中国意识形态现代化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意识形态发展变化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原则”。^[11]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包括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两个方面。具体而言,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内容或战略任务,其实质就是意识形态现代化的具体内容。借助于现代传媒技术,以感性形象表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新思想和新内容,则是意识形态现代

化展开的崭新形式。^[12]在此基础上,刘少杰教授还详细探讨了中国意识形态现代化的评价原则和评价指标。

总体而言,该书作者对我国政治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研究以及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现代化的探讨,其实都可以被视为是在新形势下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种探索性研究。

三、意识形态研究的感性转向及其现实意义

在《当代中国意识状态变迁》一书中,刘少杰教授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考察和现实生活中意识形态现象的剖析,不仅论证了意识形态的感性形式,还揭示了感性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与当下国内学术界主要从理论化角度研究中国意识形态的成果相比,该书则是一本探讨感性意识形态的存在方式、表现形式和重要作用的研究著作。意识形态研究侧重点的转变,是否代表着有关意识形态研究的一种感性转向?如果结合当代社会理论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全面审视西方学者关于意识形态研究的成果,我们就能够得出肯定的结论。

立足实践批判与反思理性,同时重新认识并肯定人类的感性,是20世纪的社会理论呈现的普遍趋势。^[13]在西方学者的意识形态研究中,这一趋势突出地表现为研究的重点由关注政治领域(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领域的意识形态,^[14]而葛兰西对宗教、常识、民俗习惯等自发意识形态的强调,则为西方意识形态研究重点的转变奠定了基础。以霍克海姆、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不仅将消费、心理、休假、娱乐、性等内容纳入到意识形态的内涵之中,而且认为工业社会之中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艺术等都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15]布迪厄虽然没有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但他从实践的立场出发,揭示了“实践感”、“惯习”、“信念”等感性意识形态^[16]对于人们实践活动的支配。特里·伊格尔顿在从事美学研究时,高度重视那些以感觉、知觉、表象而存在的感性意识形态的广泛性存在。^[17]在现代文化传媒化的背景下,约翰·汤普森充分阐述了大众传播的技术媒体不仅促使意识形态以有意义的象征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存在、传播,而且意识形态的象征形式更有助于被扩展到时间与空间上分散的、广大的潜在受众。^[18]总之,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于日常生活领域的意识形态研究,不仅揭示了意识形态感性形式的丰富多样性与现实具体性,而且也体现了意识形态研究的感性转向。

当代意识形态研究的感性转向,表明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的感性意识形态已成为研究者审视当代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全面的转型,这种变化不仅表现为外在的社会结构、行为模式等客观方面,而更为深刻的变迁则体现在内在的思想观念、价值信仰等主观领域。因此,通过研究社会不同群体、不同个体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思想观念、价值信念等感性意识形态的存在状况、具体内容以及发展变化,对于深入理解和有效处理新形势

下中国社会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7][8][9][10][11]刘少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5、228-245、237、258、266、272页。

[2]肖前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71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1页。

[4]李秀林、王子、李怀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29页;刘少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35-36页。

[5][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姚仁权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52-6页;刘少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62-69页。

[6]刘少杰教授最早在《新形势下的社会意识形态转型》(发表于《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5期)一文,提出了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转型的问题。其实,在该文之前,学术界已有不少敏锐的学者提出了这一论断,并对这一趋势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当然,这里并不是否认刘少杰教授研究的意义,而且他对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转型的丰富表现做出了更为全面而具体的概括。相关研究参见柳新元:《从意识形态转型的角度看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相对成功》,《科学社会主义》2005年第6期;谢忠文:《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结构转型:动力、路径与模型》,《“后国际危机时代的世界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2010年年会论文集》,2010年;吴金群:《中国意识形态转型30年:政治经济学的三维透视》,《理论与改革》2008年第3期;胡海波、赵德江:《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历程与观念》,《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茅晓嵩:《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意识形态的转型及其发展》,《重庆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杨江华:《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社会学分析》,《中州学刊》2010年第9期。

[12]中山大学的林滨副教授也持相类似的观点,他在《当代意识形态的发展与“文化化”》一文,阐述了当代文化媒介传播的视觉化与感性化特质,并强调意识形态的传播应当与文化媒介的特征相契合。参见林滨:《当代意识形态的发展与“文化化”》,《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4期。

[13]刘少杰:《当代社会学的理性化反省与感性论转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14][15]徐连明、文军:《论社会学视域中的意识形态研究》,《江海学刊》2007年第2期。

[16]伊格尔顿在访谈布迪厄时,曾明确向布迪厄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布迪厄也肯定了伊格尔顿的判断。参见[法]皮埃尔·布迪厄、[英]特里·伊格尔顿:《信念与普通生活:一次访谈录》,载[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等:《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51页。

[17][英]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转引自刘少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变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42页。

[18][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铨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86-289页。

[责任编辑:书缘]